

文史集萃

第 六 輯

文史資料出版社

文史集萃

第六辑

《文史集萃》编辑部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

责任编辑：俞兴茂

封面设计：范贻光

封面题字：周彤彰

《文史集萃》编辑部编

文 史 集 萃

第 六 辑

《文史集萃》编辑部编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7¹/₂ 字数：162000

印数：1—14000册 定价：1.25元

统一书号：11224·168

出 版 说 明

- 一、集萃的资料，选自各地方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各级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的文史资料。
- 二、集萃所选资料，内容包括清末戊戌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教、科技、华侨、民族、宗教、社会等方面。
- 三、刊行集萃的目的，在于荟萃上述各种文史资料的精华，方便读者购买，扩大这些资料的阅读和使用范围。选入时首重史料价值，兼顾地方特点。所选资料，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但由于作者经历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有不尽翔实之处，仅供历史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参考，欢迎提出补充和订正。

文史集萃 目录

一九八四年

第四辑

总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六十自述	李章达 (1)
回忆李章达先生(四则)	何香凝 蔡廷锴
.....	何思敬 尹翠薇 (12)
关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回忆	林一元 (27)
江庸自传	(34)
我所知道的杨杰将军	王凯亭 (39)
忆大哥朱自清	朱国华 (43)
回忆我在北洋大学	茅以升 (48)
刘海粟与人体模特儿写生	商一仁 (54)
回忆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吴 茵 (63)
回忆彭德怀将军三次接见	刘子奇 (73)
与七哥周恩来在上海的几次秘密会晤	周恩霆 (85)
一九二七年程潜由南京脱险经过	唐菊庵 (87)
李济深汤山被囚经过	李达潮 (90)
吉鸿昌立“惩前毖后碑”	刘大有 (96)
柳亚子何香凝在广东海丰	谢 创 (98)

张澜、罗隆基住院及脱险·····	郑定竹 (102)
劝阻假班禅出国记·····	王 贵 (105)
关于蒋介石家世及其早期政治生涯琐记 ·····	杨志春 (114)
我是怎样策动夏斗寅叛乱的 ·····	蓝文蔚 (123)
我在蒋介石的反共军事“围剿”中倡议碉堡政策的 始末 ·····	戴 岳 (126)
红军长征中白崇禧“开放”湘桂边境的内幕·····	汤 垚 (137)
白崇禧逼蒋下台前后 ·····	刘仲容 (142)
逃离宁夏前后的马鸿逵 ·····	马振宇 (147)
我所知道的陈公博·····	陈伯衡 (154)
汪伪政权的没落与伪官的下场 ·····	郭秀峰 (161)
一个太监的经历——回忆我的祖父“小德张” 伴随慈禧太后的岁月·····	张仲忱 (167)
辛亥以后四川的烟祸·····	胡次威 (208)
国民参政会历届参政员姓名索引·····	《传记文学》资料室 (217)

补 白

冯玉祥在常德整顿金融·····	(11)
李烈钧轶事之一·····	(26)
陈绍宽的晚节·····	(33)
陈明仁调回湖南情况·····	(38)

李烈钧轶事之二.....	(72)
李烈钧轶事之三.....	(84)
评剧的念白.....	(101)
宋斐卿东亚公司的福利事业.....	(113)
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及其第三厅.....	(122)
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	(136)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公开嘲笑.....	(141)
宋哲元病歿绵阳.....	(153)
殷汝耕及冀东伪政权.....	(160)
京剧梆子兼长的小达子.....	(166)

六十自述

李章达

在我刚过六十岁之时，伟大的祖国，已脱离灾难的深渊，中国人民是站立起来了。

我们老年人的一代，是苦难中国的一代。我生在破落地主之家。十岁以前，我父母相继死亡了，以后依靠叔父生活。在东莞县城读完了“子曰馆”进入“大馆”（即清时的高级私塾），考过两次县试。到了十六岁那一年考进了广东陆军小学校，就在那时加入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在学校里做宣传反清的革命工作。三个年头毕业后，升入南京陆军中学，在陆军中学两年间，时势演变很速，以四川为首的各地掀起了反帝的“争路潮”，穷苦的人民四处暴动，这是武昌起义的前夕。那时，我已负担同盟会秘密组织工作，与同盟会老干部谭人凤联络，这是我比在陆小时进一步的实践革命生活。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长江部分革命组织连合当地军人起义于武昌。其时，我刚在南京陆中举行毕业考试，一闻消息，便马上带领全组同志离校赶赴武昌，结合武昌陆军中学的同学们编成武装队伍，充当黄兴卫队。第一次开赴前线作战，是在汉口龙王庙码

头登陆,战斗半日,不利而退回武昌,其后又随着黄兴进攻大智门车站的清军,未能击破敌军冯国璋的防御,退到汉阳,驻守兵工厂。将近一月,而有所谓“南北议和”。黄兴赴上海,我们这一队黄兴的卫队,无形瓦解,我于此时怅惘地回到广州。

本来自武昌起义后,各省宣告独立,革命军占领了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如果当时革命领导人能够不动摇、不妥协,革命事业或不致迅趋失败。但是大多数的革命领导者满足于一时的胜利,主张南北议和,而孙中山先生就不能不让位于袁世凯。这是政治上一大错误(后来孙中山致苏联齐采林书所坦白承认的)。

在我当时看来,能够认识这一错误的,似乎只有朱执信先生。朱于辛亥之次年(即民国元年)在广州即着眼于紧靠民军,编练与整顿民军作为建立基本革命武装,自然他收编了不少农村中的绿林人物,因为他反对利用旧军阀作风,他根本不相信当时由巡防营陆军等转变过来的那些队伍。他为着要把起自民间的民军健全起来,于是派出了若干有革命思想的陆军学生到各民军队伍中担任教练员,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教练顺德绿林首领黎炳球这一营的。其时广东都督陈炯明态度与朱相反。且对民军首领屡加迫害。石锦泉被杀了,王和顺、陆兰清被驱逐了。我在广州始终追随朱执信先生工作,我觉得当时国民党领导人物中,他是最可敬佩的一人。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刺,六月间孙中山到日本重新组织中华革命党^①,中山左右高级干部多数怀疑这一举

^①《中国近代史词典》记载: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在日本中华革命党,立

动，而朱执信则坚决拥护。七月，李烈钧举兵湖口，各地响应组织讨袁军，当时我参加李烈钧的行列，失败后，逃到上海。

经过袁世凯称帝，唐继尧独立，所谓“护法之役”，一九一六年李烈钧率部与桂军到达广州驱走龙济光，我当时在李烈钧统率下的滇军任少校参谋职。直至一九一八年，陈炯明在汕头成立“援闽粤军”，邓铿任总参谋长，我就转到邓铿幕下任少校参谋。随军进攻福建，我参预漳州江东桥之战役。但当漳州占领之后，陈炯明即安于富庶的闽南，开始作逐利之计。我不满这种军阀割据作风，便离开漳州回到广州。

经过孙中山炮击莫荣新这一幕之后，孙偕朱执信到了上海，当时孙左右的一班高级干部都一致埋怨朱执信，说朱不应独自密赞孙而助成炮击事件。又说朱不肯改去“绿林民军”的作风。一九一九年夏间，我接到朱先生由上海来信，要我到上海工作。我于是到上海，见过孙中山、廖仲恺，知道朱先生正在筹办《建设》杂志。我就在这杂志社里面做发行业务工作。朱先生的革命理论，我在此学习了不少。

是时刚在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及其附和者已表露他的思想：把新文化运动局限于白话文运动。朱先生就感到这是“新文化的危机”，他曾这样说：“阶级斗争是现存的事实，不是想出来的手段。”他斥责空谈“奋斗”，而实际反对阶级斗争的那些人们。他对知行的说法，比之孙中山先生似有较深认识，他说：“真正学问，是同社会有脉络贯通的，同实际生活联成一气的，没有做事，他这学问是悬空的。”他对于群众运动也有较进步的看法，他认为“群众运动真实的力量是多数的意志力”，他觉得当时“不留名声，不留目标”的一类群众运动促进者实在太少。他创办

《建设》杂志是在于对群众运动作思想教育。其时孙中山及其左右已开始认识“联苏”与“扶助农工”的重要，当然除了朱执信及廖仲恺之外，其他还是主张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

孙中山希望取得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他决定派朱执信往苏联考察，并指定我做朱的助手。朱先生和我即做些准备工作并学习俄文、俄语。但是到一九二〇年十月粤军从漳州回粤驱逐了陆荣廷、莫荣新，在广州恢复“护法政府”。朱执信即随孙中山返粤，赴苏联考察计划无形打消。朱返粤不久，突然被刺，他的遇害，是革命的一大损失。其后，我借着机会由廖仲恺先生指示并给我旅行所需的资料，我终于到达了苏联伯兰俄维辛（当时称远东共和国）因为其时赤塔有战争，我不能完成我的旅行，乃辗转经天津返广州。向孙中山作了一个简单的旅行报告。

一九二一年，我被派到邓铿的陆军第一师工作，任工兵营营长之职。同事中有叶挺、邓演达等。孙中山深感革命进行不能停滞，于是准备出兵湖南，进行北伐，把当时在广西的滇、赣、粤各军集中，在桂林设立大元帅府行营；但坐镇广州的陈炯明别有企图，他暗中勾结了吴佩孚，秘密破坏北伐军事。在广州的将领有实力而最积极革命者只有邓铿一人，孙遂嘱邓在其部队中挑选青年干部组织警卫团，随帅府行营任警卫之责。以三个步营及机枪一连编成为警卫团，陈可钰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因陈可钰兼任师部参谋长，不能离开广州，故警卫团实际由我率领开赴桂林负担任务。其后警卫团扩成两团，我任第二团团团长兼大元帅府参军。

正在桂林布置北伐军事，准备由全州入湘之际，而陈炯明破坏北伐的举动渐趋显著，他断绝了北伐军的后方接济，竟纵其部下暗杀了邓铿。这个暗杀消息一到桂林，大家都知道局面破裂了。

孙中山遂率领警卫团回粤。陈炯明则避回惠州。孙仍图感化说服陈炯明，但陈已包藏祸心，命洪兆麟、叶举等起期作乱。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夜间围攻观音山总统府。警卫团寡不敌众，给他们攻入缴械。孙中山事先已化装避至永丰舰。次日我亦逃至舰上。舰队集中黄埔坚持一个多月，同时号召北伐军由北江回师反攻。其时廖仲恺先生已被诱捕于石龙，北伐军一时未能回穗，孙中山乃离粤赴上海，在此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和孙中山会谈了两天，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续后孙中山接待苏联特使越飞，经过商谈之后，表示接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发表了有名的孙越共同宣言。

回师广州未成的北伐军，由许崇智率领越江西边境攻入福建，把北洋军阀李厚基打败，占领福州，成立东路讨贼军总部。我就被派到福州任总部副官长职，蒋介石荐委他的亲信刘峙、顾祝同到副官处当副官。那时我对蒋介石还很客气。

一九二三年二月东路军由闽回粤，时广西的杨希闵、刘镇寰已攻走陈炯明，占据广州。孙中山重返广州。一九二四年一月，举行改组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体现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国革命便得到了比过去进一步的发展。在此期间，我已辞去军事职务，跟随廖仲恺先生做些零碎的党务工作。

在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间，经过了有名的省港大罢工，经过了镇压商团暴动，帝国主义惊惶失措。一九二四年底^①，孙中山为了和平救国，北上会晤段祺瑞，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

^①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应北京政府之邀北上。——编者

于北京。其后廖仲恺先生又遭反动派暗杀。中国革命运动受到了重大损失。我精神上所受到自有生以来的极沉重打击，实难以言语形容。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蒋介石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告开始北伐。可是在此以前，即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的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召开了西山会议，公开反对三大政策。另一派以蒋介石为首的罪恶集团，表面伪装拥护革命，暗中组织反革命活动。（最清楚的事实是：逼走苏联友人基散加，用武力围住东山一带的苏联友人各住宅，并挟持汪精卫，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做出来。）到后来，北伐军到达上海，即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发动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大叛变——“清党”大屠杀。

在一九二六年二月，我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倾向进步，与中共同志杨殷、杨匏安、邓中夏经常联系。我认为警察应与群众建立亲密关系，于十月间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工警联欢会，我强调工警合作。不料却为张静江（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后方负责人）所不满，传召我去见他，当面责骂，说我言论太左，“举动乖张”。他随即密电蒋介石，要我辞职，我就实行辞退，由蒋介石派钱大钧来接任。我的辞公安局长职，意味着广州政治气压的低沉，进步群众预感到逆流迅将到来。我自此一辞职之后，即在香港隐藏居住。其时杨殷曾到香港访我，挽我出来工作，我那时徬徨歧路，未敢即时答应。不久，“清党”屠杀竟尔开始。

一九二七年张发奎率军南下，反对李济深支持汪精卫。我于那年十一月初，由香港返广州，会见了张发奎。匆促间，往福州走了一次，主要是劝蒋光鼐、蔡廷锴等与张发奎合作，但无结果。这里，我得回溯一下，当孙中山逝世与廖仲恺先生被害之

后，没有一个像朱执信那样的人。在我心目中，汪精卫是比较进步的。当然，后来我发觉他是投机善变的人物，就与他疏远了。当在蒋介石暗中组织反革命活动时候，他却自认为“革命派”，并认为“无论共产党、非共产党，都应一致努力为革命而奋斗”。这些话是很动听的，我也或多或少被他的话吸引了。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公社起义，我于次日即由广州回到香港。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年汪精卫在北平、广州发起并举行过扩大会议、非常会议，汪派陈公博、沈崧前后携函邀我参加，（我还记得，汪在赴北平时亲笔给我的函里有句话：“国家民族之安危，革命大业之成败，在此一行，个人荣辱得失非所计也”。（此函我在香港时曾给朋友陈此生看过的。）我都婉词推却。但在反蒋意义上，只接受他委托赴赣州，劝陈铭枢、蒋光鼐联合陈济棠反蒋，但无结果而回香港。

十数年来，蒋介石专横独裁，……固非推翻他的统治不可，但经过多次国民党内反蒋事件，我对革命有进一步的认识，深觉得非从根本上进行变革不可，所以我对于汪的改组委员会及胡的新国民党组织等根本不同情。

蒋介石的剿共卖国政策，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爆发了沈阳事变，蒋下令不抵抗，转瞬间而东北全部沦陷。翌年（应为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抗日。这一正义的呼声，使我很受感动。“一·二八”前夕，我承蒋光鼐之邀，到了上海，不数日，十九路军发动了淞沪抗日战争，我以私人资格协助。这次战争为蒋介石叛卖而结束。

一九三二年冬间，宋子文着陆文澜携函并蒋介石的亲笔函到

香港访我出来做事。陆文澜说：“蒋介石拟发表蒋光鼐为福建省府主席，蔡廷锴为福建省绥靖主任，要我当福建省府委员兼秘书长”。我作过这样的考虑，就是说，经过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其中可能有些分子是积极反蒋的，因此我就答应了他。过了若干日子，蒋介石电催我到汉口，向我说明闽省府人事安置情形，随后就把名单全部发表了。我到福建就职后不久，见诸事困难，情况复杂，我虽然替他们起草过一个“粤、桂、赣、闽四省联盟约章草案”，但不能真正实施，我于是请假离开福州回到香港。及至福州革命起事前十余日，我由香港到福州，参加福州革命政府任中央委员兼政治保安局局长职。当时有些人对于完全站在国民党外反南京这一问题，似乎仍有多少顾虑与犹疑，主要是为着怕粤、桂、闽联盟破裂所生之后果。我觉得这回事无可迟疑的，粤、桂、闽联盟徒有其名而已，后来福州革命宣言一发出，桂派就来反对，足证所谓“联盟”实在是无基础的。我建议应立即宣告脱离国民党，重新组织革命政团，进行革命，大家推我起草脱党宣言，并由我领衔发出。福州革命军事失败，大家又推我赶快到香港见胡汉民商量善后收拾办法。我到香港见胡之时，适孙科亦在座，胡则婉言权不在己，孙则直接责难，我遂无言而退。此后我参加了民族革命大同盟的组织，又与何思敬等组织救国会南方总支部，鼓吹抗日救国。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日战争发动，全国无分南北老幼，奋起抗日，我以救国会负责人资格鼓吹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陷敌，余汉谋退北江，我集合同志，策划组织抗日武装。适值叶挺辞“广东第四游击司令”职，“四战区”命我继任，我到深圳设立指挥机构，领导工作，但游击队伍大部分

散。又恐汉奸混入，使组织不纯。最纯洁而组织化纪律化的只有曾生、王作尧部队，他们部队在斗争中日趋坚强，在坪山一带长期坚持，直至日本投降。大家都知道，在蒋介石充满反动性的消极抗日政策下，纯洁的游击队，无法获得政府方面接济的，惟有当地人民广大群众努力出来支援。我在深圳不到两个月，被调回韶关，改任“四战区军法执行监”兼“战地党政分会委员”。不久，又被迫辞去“军法执行监”，去职的原因，是我不肯填表重新加入国民党。那时蒋介石命他侍从室严令所有军事单位转令一切军职人员入党编组，不得违背，否则受处分。我向张发奎说：

“我既在福州时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此时无理由填表加入”。张于是命余恺湛转知我，令我赶速递辞呈，我就这样去掉军职。

一九四一年初，皖南新四军事件发生，一时政治气压低沉，特务分子时常向我攻击，在某次集会上，黄麟书公然打击我的发言。其时民主人士陆续聚集香港，我遂离韶赴港，会见了邹韬奋、杨东蓀、千家驹、陈此生等，梁漱溟亦到港活动，酝酿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办《光明报》，梁强调反对一党专政。我被推入内地活动，相机商请李任潮出来主持。我重入内地留住韶关，接得梅龚彬由桂林来信，谓任潮先生有民联民促之议，故民盟之议不作正式提出。其后，杜斌丞先生到韶关访我，意见相合，我随即到桂林，会见了梁漱溟、李任仁、陈此生等各位先生，商谈结果，拟订了民盟组织的初步计划。

一九四一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我在韶关一连两年多时间，与桂林交通阻隔，韶关环境恶劣，民主运动无从展开。至一九四四年底，韶关疏散，我迁到梅县，与张文等以及抗日先锋旧日同志大家时常商讨加强地方抗日武装问题。民主进步势力不

弱，但因当地反动分子严密侦查和监视我们，遂致工作不能大量展开。迨“八一五”日本投降，我从梅县返广州，建立民盟南方总支部，与丘哲、张文等积极展开民主运动。

在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又要掀起罪恶的内战，我们民盟的主要努力，是响应中共号召，坚持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的努力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蒋介石乃运用其惯用的欺骗伎俩，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签订了“国共双十协定”通过了决议，但不旋踵都一一加以撕毁。一直到发动内战，始终受美帝国主义指挥操纵，其卖国行为，固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于此又足见美帝国主义之阴谋侵略。其时…马歇尔正在指挥操纵。广东方面反动当局随着局势恶化而拚命压迫民主进步力量，特务捣毁了兄弟图书公司和《华商报》广州分社，当时，我尽我之所能，在惠爱路旧大新公司召开书报界及各方代表的座谈会宣布此事。又打电话给张发奎，请他禁止这种猖狂态度。及后，谈到东江纵队问题，张发奎还不承认广东有中共所组织的游击队，我和他辩驳了一番，结果，东纵被迫北撤，跟着《华商报》广州分社被封，民主进步人士被迫害，日渐加剧，我和民盟南总全部迁到香港，继续工作。

内战一天天扩大，反动气焰一天天高涨，各方民主人士相继跑香港，策动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国民党民主派由李济深领导在香港举行代表会议，筹组革命委员会，我以政见相同，乐于参加。一九四八年一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声明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关系，反对独裁，反对内战，主张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各民主党派携手前进。我被推为中央委员兼任秘书长。值其时，我患心脏病相当严重，卧病澳门，然经常扶病过